

# 红旗

HONGQI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

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

飞夺泸定桥

改

一九六五年

9



#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九期 目录 ★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 (1)

### 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破产 .....朱洪元 (21)

在不断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 .....高崇寿 (25)

对于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分子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些看法 .....徐光宪 (28)

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龔育之 (31)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武器 .....艾思奇 (36)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 .....于光远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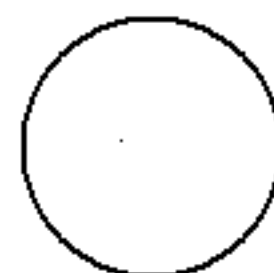
### 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

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 .....李哲 (42)

飞夺泸定桥 .....杨成武 (48)

大石塔农村的变革 .....徐雅 (55)

☆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

毛泽东

**编者按：**今年九月三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本刊这一期特别刊印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名论文。这篇论文所阐明的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了伟大的指导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注释：“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同志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許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非常清楚，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今天，对于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合作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般战役的合作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碰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



略問題頗有許多特殊的東西；抗日戰爭的一般戰略問題中的東西，決不能照樣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擊戰爭。

## 第二章 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在具体地說到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先，還要說一說戰爭的基本問題。

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于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這個原則，在革命戰爭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則聯系着的。例如中國抗日戰爭的基本政治原則即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在軍事上實行起來，就是以軍事力量保衛祖國，驅逐日寇。為達到這個目的，在軍隊本身的行動上，就表現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滅敵人的力量。何以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每一戰爭都須支付代價，有時是極大的代價，豈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正確點說，是相反相成的。因為這種犧牲，不但是為了消滅敵人的必要，也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一部分的暫時的“不保存”（犧牲或支付），是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這個基本的原則上，發生了指導整個軍事行動的一系列的所謂原則，從射擊原則（隱蔽身體，發揚火力，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後者為了消滅敵人）起，到戰略原則止，都貫徹這個基本原則的精神。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則，都是執行這個基本原則時的條件。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是一切軍事原則的根據。

## 第三章 抗日游擊戰爭的六個具體戰略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抗日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應該採取些什麼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呢？因為抗日戰爭中（乃至一切革命戰爭中）的游擊隊一般是从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還須加上一個發展自己。所以問題是：應該採取些什麼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或發展自己和消滅敵人的目的呢？

總的說來，主要的方針有下列各項：（一）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綫作戰中的外綫作戰；（二）和正規戰爭相配合；（三）建立根據地；（四）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五）向運動戰發展；（六）正確的指揮關係。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途徑。



##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箝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的了。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箝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共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





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必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





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箝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



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



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杨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箝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sup>①</sup>、五台山<sup>②</sup>、太行山<sup>③</sup>、泰山<sup>④</sup>、燕山<sup>⑤</sup>、茅山<sup>⑥</sup>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①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边境的山脉。九一八事变后，长白山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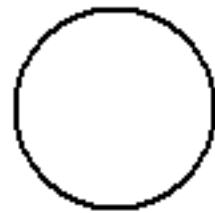
② 五台山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始以五台山区为中心，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③ 太行山是山西、河北、平原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④ 泰山在山东中部，是泰沂山脉的主峰之一。一九三七年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开始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建立鲁中根据地。

⑤ 燕山是河北、热河边境的山脉。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以燕山山区为中心，开创冀东抗日根据地。

⑥ 茅山在江苏南部。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开创苏南抗日根据地。



平地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sup>①</sup>。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之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

<sup>①</sup> 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而得到的。毛泽东同志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



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共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





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





生选择经济条件的問題。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問題，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



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sup>①</sup>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說，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sup>①</sup> 围棋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棋。双方的棋子互相包围，此方的一个或一群子被对方所包围，就被“吃”掉。但如果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仍保有必要的空格（“眼”），那末这群子就可不被“吃”掉，仍是“活”的。



敌人为了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箝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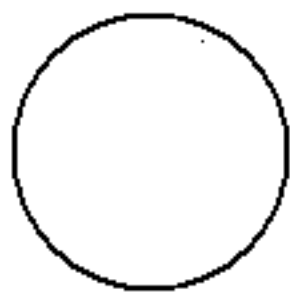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充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箝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sup>①</sup>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

<sup>①</sup> 公元前三五三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齐王命令田忌、孙臆率军救赵。孙臆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内部空虚，乃引兵攻魏，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在桂陵（今河南省菏泽县东北）一战，大败魏军，赵国之围遂解。以后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一切类似的战法。



爭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沒有房子住和沒有飯吃，害了他們自己。这就是所謂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經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緒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則錯誤，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問題：留着許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轉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們應該估計到在某些特別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问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經驗，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揮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針，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陣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驅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訓練部队，組織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綫，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軍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縮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訓練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訓練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門来休息和訓練，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爭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訓練的目的。解决給养被服等困难問題，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綫，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規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殘的地区



也逐漸整理，恢復元氣。敵占地區內的民眾亦十分高興，到處都傳播游擊隊的聲威。敵人及其走狗漢奸的內部，則一方面發展着恐慌情緒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對於游擊隊和根據地的仇恨，加緊地準備着對付游擊戰爭。因此，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不可在自己的戰略進攻中得意忘形，輕視敵人，忘記了團結內部、鞏固根據地和鞏固部隊的工作。在這種時候，須善於觀看敵人的風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進攻的朕兆，以便一遇進攻，就能適當地結束我之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再從戰略防禦中粉碎敵人的進攻。

## 第八章 向運動戰發展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五個問題，是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於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而來的。如果中國能迅速地戰勝日寇，並迅速地收復失地，沒有什麼持久戰，也不是什麼殘酷的戰爭，那末，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戰爭是長期而且殘酷，游擊戰只有向運動戰發展才能適應這樣的戰爭。戰爭既是長期的和殘酷的，就能夠使游擊隊受到必要的鍛煉，逐漸地變成正規的部隊，因而其作戰方式也將逐漸地正規化，游擊戰就變成運動戰了。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明確地認識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堅持向運動戰發展的方針，並有計劃地執行之。

現在許多地方的游擊戰爭，例如五台山等處，是由正規軍派出強大的支隊去發展的。那裡的作戰雖然一般是游擊戰，但開始即包含了運動戰的成份。隨着戰爭的持久，這種成份將逐漸地增加。這是今天抗日游擊戰爭的長處，不但使游擊戰爭迅速地發展，並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較之東三省的游擊戰爭，條件優越得多了。

由執行游擊戰的游擊部隊化為執行運動戰的正規部隊，須具備數量擴大和質量提高兩個條件。前者除直接動員人民加入部隊外，可採取集中小部隊的辦法；后者則依靠戰爭中的鍛煉和提高武器的質量。

集中小部隊，一方面，須防止只顧地方利益因而妨礙集中的地方主義；另一方面，也須防止不顧地方利益的單純軍事主義。

地方主義是存在於地方游擊隊和地方政府中間的，他們往往只顧地方的利益，忘記全局的利益，或貪圖分散活動，不慣集團生活。主力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的領導者們，必須注意到這種情形，採取逐漸地和部分地集中的辦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夠繼續地發展游擊戰爭；採取首先協同行動然後實行合編以及不破壞共建制不撤換其幹部的辦法，使小集團能夠融合於大集團。

單純軍事主義和地方主義相反，乃是主力部隊里頭的人們只圖擴充自己不顧扶助地方武



装的一种錯誤观点。他們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漸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錯誤，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須在政治、組織、装备、技术、战术、紀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漸地仿照正規軍的規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須使指揮員、战斗員們認識从游击队到正規軍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組織上須逐漸地具备为一个正規兵团所必需的軍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軍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員，軍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給卫生等的經常制度。装备方面，須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訊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規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紀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現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須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現。这种目的，在有正規軍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較順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規軍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規部队发展的責任。

## 第九章 指揮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問題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揮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順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揮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級的武装組織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許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規战争的指揮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規战争的指揮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縛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揮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揮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揮就能够順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規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規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揮，这就是国家參謀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統一指揮。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





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本文原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





# 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最近，北京的一部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座谈了关于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下面是座谈会上的几篇发言。希望大家讨论。本刊准备继续发表关于这类问题的文章。

——编者

## 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 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破产

朱洪元

《红旗》刊登的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是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

日本的理论物理学是后起之秀。在本世纪的最初三十年，相对论的产生以及量子力学的形成和发展，使理论物理学产生飞跃的变化，但是其中并没有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很大的贡献。今天，以坂田昌一这个学派为代表的日本的“基本粒子”理论，已经站在世界的前列。论基本粒子物理的实验条件，日本比某些欧美国家差。日本只有一些关于宇宙线的实验研究工作，此外就只有一架能量

为十亿电子伏特的电子加速器。但是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了核子力的介子论，量子场的超多时理论和重正化理论，二种介子和二种中微子的假说，西岛——盖尔曼法则，SU<sub>3</sub>群的基本粒子分类法等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贡献，超过某些实验条件好的欧美国家。

为什么以坂田昌一这个学派为代表的日本的基本粒子理论发展得这样快，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呢？

在去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我从坂田



昌一教授的谈话知道，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就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后逐渐努力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们着重研究了理论物理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当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风靡理论物理界的时候，他们能顶得住，不盲目跟着西方跑，敢于闯出自己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他们能够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要在科学工作中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力争在理论思维上的主动，打破框框，敢于闯出自己的道路。只是盲目地跟着外国走，是永远赶不上国际先进水平的。

考察一下近代物理学发展史，就可以发现，在物理学研究中弯路是走得很多的。因为前人走弯路，所以后来者可能居上。但是有一个条件，后来者必须少走弯路，走正确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假使前人走弯路，后来者也跟着重复走前人的弯路，后来者还是赶不上前人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理论发展的阻碍作用很大。

经典物理学在解释宏观物理现象时取得的成就，使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法拉第电磁理论被看成是绝对不变的真理，是关于物理世界的最终的理论。在牛顿力学能基本

上说明太阳系中行星绕日运动现象之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甚至使得拉普拉斯得出了如此荒谬的意见，他认为只要把宇宙中一切粒子的初始坐标和动量都测量出来，就可以推算出整个宇宙未来的历程。

但是，在物理学的实验研究深入微观物理现象以后，经典物理学的局限性终于暴露出来，在一系列的新的实验事实和经典物理理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对于辩证唯物论者来说，实验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应该伸出双臂欢迎。但是，对将经典物理理论奉为最终真理的形而上学者来说，这种实验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理解的怪物，必须将它掩盖和埋葬。然而，矛盾是掩盖和埋葬不了的。所有一切掩盖和埋葬矛盾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客观上起了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

粒子-波动二重性是微观世界区别于宏观世界的根本特点，也是微观世界的一个基本矛盾。物理学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使他们长期无法接受这一辩证的思想。

在今天，瑞利-金斯关于黑体辐射的理论工作被描绘成为量子论产生的催生婆，说它突出了新的实验事实和经典物理理论之间的矛盾。但是历史并不是这样的。瑞利和金斯本人力图在经典物理学范围内解释黑体辐射能量的频率分布。他们在发现了经典物理理论所给出的黑体辐射的能量密度公式随着频



率趋于无穷大，和实验结果尖锐地相矛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揭露矛盾的想法。与此相反，他们提出一些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力图将经典物理学和新的实验结果之间的矛盾掩盖过去。

普朗克在一九〇〇年提出的关于黑体辐射的量子论，是试图突破经典物理概念的一声春雷，但是在这以后整整五年，没有什么人注意这一革命性的理论。令人深思的是，在这以后整整十五年，普朗克却力图抹杀他自己所提出来的革命性的量子概念，企图将一切纳回到经典物理学的框框中去。

爱因斯坦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光子的假说，揭露了光的粒子-波动二重性。然而不仅量子论的创始人普朗克认为这一假说太极端了，甚至到一九二二年，原子结构的量子理论的奠基者玻尔还认为光子假说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情况使得物理学界在一个长时期里很少有人继续爱因斯坦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德布罗意才将波、粒二重性的思想推广到所有的微观客体。在德布罗意工作的基础上，薛定谔很快就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薛定谔方程。可否设想，物理学家有可能在一九〇五年之后不太久就提出所有微观客体都具有粒子-波动二重性的假说。这一假说之所以推迟到一九二四年才出现，看来物理学家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是主要原因之一。

量子力学建立的过程说明，物理学家自发地走出形而上学的框框、到达辩证法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诚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复归（指由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复归——引者）能够由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它可以仅仅经过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而自然而然地达到，因为这些发现再也不能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枷锁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非常多的多余的阻碍。”<sup>①</sup>

科学家自发地走出形而上学的框框，不仅得走很多弯路，而且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又走进唯心论的怀抱。早在一九〇八年，列宁就说：“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sup>②</sup>哥本哈根学派的经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分析这一学派建立矩阵力学时所用的方法，可以发现，起主要作用的有下面两点：

(1) 将经典物理学所根本不能解释的、关于微观世界的新的实验结果，当作客观事

<sup>①</sup>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5 页。

<sup>②</sup>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76 页。



实接受下来，并把它们作为建立新理论的基础。

(2) 应用对应原理去处理经典物理学，抛弃经典物理学中不适合于描述微观世界的部分，吸收其适合于描述微观世界的部分，并根据微观世界的基本特点对经典物理学中这一适合于描述微观世界的部分进行深刻的改造，以之作为到达新的理论的跳板。

不论新的实验事实怎样尖锐地和经典物理学相矛盾，还是将它们接受下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理论，从而反映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在本质上的差别。在建立反映微观世界的特殊规律的新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将经典物理学全部抛掉。一方面考虑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差别，考虑了微观世界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考虑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联系，考虑了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科学方法，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

但是，正因为哥本哈根学派当时这样做不是自觉的，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强有力的指导，所以他们在从自己的科学成就中总结哲学上的经验和教训时，形而上学方法又在那里作祟了。他们片面地强调了否定经典物理概念这一方法所起的作用，将这一方法绝对化，一直发展到否定一切不能或没有为仪器所直接探测到的物理概念。在科学研究中认为仪器所直接测量的结果就是一切的观点，

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感觉就是一切”的观点。这是实证主义的观点。

将现象绝对化，否认现象背后的本质，就从根本上堵塞了认识发展的道路。哥本哈根学派的实证主义在最近四十年来在理论物理界中有广泛的影响，给理论物理学带来混乱，使理论物理学在发展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玻尔在三十年代初认为在 $\beta$ 衰变中能量不守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们认为，一切没有为当时的实验技术直接探测到的东西，尽管在实验上有很强的间接的证据表明其存在，都是主观上的虚构。在这种气氛的压力下，甚至到了一九三七年，费米还不敢认真地看待自己所提出的以中微子的假说为基础的 $\beta$ 衰变理论。由于同样的原因，坂田昌一教授的 $\pi$ 介子的假说被埋没了五年，他的 $\theta$ 介子的假说被埋没了二十年。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海森堡在一九四二年所提出的关于基本粒子的S矩阵理论。这一理论否定了除在实验中可以直接测定的能级、衰变寿命和碰撞截面之外的所有微观物理概念。否定了现象背后的本质，理论当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为了给这一空架子填补内容，邱(G. Chew)乞灵于某种关于理论的数学形式上的假说——所谓理论的数学形式具有最大解析性的假说。近年来有许多理论物理学家钻进了这一死胡同，走了许多冤



枉路而很少收获。

坂田昌一教授在《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中指出：哥本哈根学派的实证主义在理论物理学界形成这样一种气氛：把基本粒子看作有内部结构的东西似乎就是罪过。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这一形而上学思想之所以长期地、广泛地在物理学界流行，从而阻碍物理学家探索基本粒子的结构，是和哥本哈根学派实证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

这些历史教训一再地提醒我们，科学家必须努力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工作。

在每一次物理学的大革命中，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都要深入一个层次，都要发掘

出来一些更深的层次所特有的矛盾，也就是先前的层次所不能包括的新的矛盾。我们革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无限性，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像恩格斯所教导的那样，把每一次的新发现，当作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sup>①</sup>。这样，我们就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永不满足，永远感到有一种动力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客观世界的未知的真理，从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0页。

## 在不断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

高 崇 寿

从近代物理学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这是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十九世纪末以来，实验不断发现一系列新的现象，不断地冲击传统观念。相当长时期以来被许多人认为是最终理论的经典物理学，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迫使我们从基本上修改了许多重要的

概念。相对论建立了，量子力学建立了，在这基础上近代物理学的各分支都取得了很迅速的发展，丰富了人们对物质结构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也对先进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这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出现许多的曲折，不少曾经对物理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物理学家，在



后来的研究中，走着走着就走上了斜路，不再前进了。而且往往前人犯了錯誤，后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这样的例子，屡見不鮮，确实值得我們深思。

列宁在本世紀初就指出，近代物理学以它所取得的进展，不断地证实着辯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是西方許多資產階級学者从他們的世界观出发，难以接受这一点。他們往往是在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轉来轉去，終究轉不出这个圈子。回顾历史，考察現况，可以看出，这是现代物理学发展中所以常常重复以往錯誤和不断出現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待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論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难以理解这一点，从而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只看到現有理論所存在的問題，对它抱过分否定的态度；另一种是只看到这个理論所取得的成績，很少去考虑它可能存在的問題。这两种傾向都妨碍着科学理論的进一步发展。推进現有理論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往往是由一批新的敢于打破框框又善于继承的人来实现的。常常出現这样的現象，随着理論的一次次更新，科学闖将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更新。量子力学的几个創始人代替了旧量子論的权威，而他們在以后量子場論的发展中又退居次要地位。这样的現象在近代物理学发展的几十年历史

中頻繁地出現，許多理論物理学家在对理論的发展作出貢獻之后，往往就以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作为框框，把自己圈起来，再也走不出去。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縛。

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科学理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理論和实践的矛盾所推动的。許多西方理論物理学家却非常害怕矛盾。当大量的新的实验事实显示出和旧有理論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时，总有一批人想尽办法来迴避和掩盖矛盾，維護旧的理論。从經典力学的观点来看，正在开行的火車上的观察者观察到的力学規律和地面上的一样，可是对于电磁学規律就不同了。这个基本观点上的內在矛盾，显示出理論需要发展。十九世紀末期对光的传播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得到的結果和經典力学的传统观念发生严重冲突，使矛盾尖銳起来了。人們曾作过种种尝试，企图通过光的传播媒介具有許多奇怪的性质的假定来調和这个矛盾，但总是解决不了問題。直到实验上发现了真空中光速不变（对各慣性系相同）之后，才以此为起点突破了經典力学的观念的框框，建立了新的理論——狹义相对論，从而解决了这个矛盾。

有一些人在新的实验事实和旧有理論的尖銳矛盾充分暴露以后，也自发地采取了承认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态度，从而对理論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当他们解决了这些矛盾、取得了理论上的进展之后，就往往把自己设想的情景当作物质世界的全部规律性，再也不去考虑客观世界中还会有更内在更深刻的矛盾，不再去自觉地注意实验所揭示的新的矛盾，而沉溺于对现有理论进行修补雕琢，企图使它成为包罗万象的、无矛盾的最终的理论。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在初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以后就再未能作出新的重要贡献，其原因往往就在于此。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海森堡，就企图建立一个统一描述“基本粒子”的最终理论，结果工作了许多年也没取得什么重要成就。近十年来，在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中发展起来了色散关系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它克服了原有理论中的某些困难，使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前进了一步。但是又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色散关系理论是最终理论的苗头，甚至有人宣称自己不需很长时间就能突破了。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真理的标准。基本粒子物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目前实验资料还相当不完全。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善于充分利用这些不够完全的实验资料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实验不断发现的一系列新现象，经常对旧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冲击。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包括运用相当抽象的数学工具，提出相当抽

象的新概念和假设，通过实践检验使之成为新的理论。

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物理学家中有一些人，却热中于完全不顾实验依据地进行大量的所谓理论探索。这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潮，似乎他们提出的“理论”的意义，主要取决于是否内部自相协调，是否有完整系统。至于这些“理论”将来是否能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则抱着摸头彩的心理。

这种思潮反映了对待理论和实验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它使理论的探索走上斜路。这样的工作，难以对基本粒子理论的进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却会造成假象，起了转移视线的作用。

从上面所讲的几点就可以看到：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严重地阻碍着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工作中可能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取得若干重大的成果，但是很容易又走上斜路。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难以跳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是由他们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为了使我国的科学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起来，学会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科学工作。





# 对于用唯物辩证法指导

## 分子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些看法

· 徐 光 宪 ·

《红旗》刊登坂田昌一的文章，给我们很多启发。坂田昌一在“基本粒子”研究中自觉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我们有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良好条件，如果能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一下我们所从事的科学领域的发展道路，记取有益的经验和走过的弯路的教训，摆脱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这样一定能使我国的自然科学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这里，准备对现代分子结构理论发展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和前景，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批评讨论。

现代分子结构理论共有三大学派，即价键理论、分子轨道理论与配位体场理论，都是在量子力学提出后不久创立起来的。价键理论强调两个原子之间电子配对成键的原理，与化学家熟知的价键概念相一致，发展较快。但是，根据电子配对形成单键、双键、三键的概念，不能解释苯和其他共轭分子的结构，这是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矛盾。

在科学上，每当发现重要的实验结果与现有理论相矛盾时，往往是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种时候，方法论的指导有很大的作用。科学家在处理这类矛盾时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会直接影响到理论上能否取得成就。

当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之间发生的不是根本性的矛盾时，科学家常常借助于某些合理而且有根据的假定，对现有理论作一些补充或修正，把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统一起来，使现有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是，如果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发生带根本性的矛盾，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这时，科学家可能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

(1) 借助于某些往往是缺乏根据的、有时甚至是显然不合理的假定，把实验结果与现有理论的矛盾调和起来，弥补起来，纳入到现有理论的框框中去。有些科学家在这样做了之后，由于维护了已经深入人心的旧理论而得到莫大欣慰，至于这些假定是否可靠，



就认为不那么重要了。

(2) 完全抛弃旧理论，另起炉灶建立新理论，或发展原先已有但由于某些原因被人忽视的另一派理论。这样做的结果，由于把旧理论中正确的合理的东西也统统抛弃了，就往往又形成具有另一方面严重缺陷的理论派别。

(3) 一分为二地对待现有理论。仔细审查现有理论的全部内容，有意识地安排实验或搜集资料，来尽可能充分地揭露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之间的矛盾，然后在克服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辩证地否定（按列宁的说法，这是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现有理论，批判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另创符合或接近于客观规律的新理论。这时候如果有另一派理论存在，也应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仔细分析它的优缺点，反复在实验中考察，以便抛弃其中错误的东西，吸取其中合理的内容，使新创造的理论更加完善。

上述第一、第二两种方法都是片面性的，采用它们来处理理论和实验之间带根本性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现代分子结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处理价键理论与像苯这一类的共轭分子结构的矛盾，鲍林在三十年代初提出了“共振论”。几年前，科学界对于“共振论”的评价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认为，这一理论对

于处理这个矛盾，采取的是上述第一种方法，它的特点，是保守经典结构理论关于四种基本键型（单键、双键、三重键和离子键）的框框，而用这种键型的“结构共振”这个人造的假定，来弥补旧有理论不能描述共轭分子结构的缺陷。

采用第二种方法处理矛盾的是分子轨道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分子的整体性，认为分子中的电子为整个分子所有，而不注意分子内部有关原子间电子配对成键的情况。它虽然克服了价键理论特别是共振论的许多缺点，但却没有把价键理论的优点吸收进来，未能成为大家一致公认的理论。

随着科学的发展，尔后又出现了一类新的矛盾，即无论价键理论或分子轨道理论都不能定量地解释络合物的许多特性，所以近十年来特别迅速地发展了分子结构理论的另一学派，即配位场理论。这一理论在络合物光谱和磁性的定量计算方面得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也有不少缺点和局限性。

价键理论、共振论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比起分子轨道和配位场理论来，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那末，价键理论的发展是不是没有前途了？不，我认为，价键理论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作为价键理论重要支柱的经典结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还是适用的。但是，针对经典的基本键型不能反映某些分子结构



的矛盾，應該採用上述的第三種對待矛盾的方法，盡量揭露這些矛盾，在總結大量新的實驗材料的基礎上，不斷發掘新的化學鍵類型，從理論上來分析這些新型鍵的本質，把分子軌道和配位場理論中成功的方法和有益的概念吸收進來，並盡量借用理論物理中已有成效的方法（如群論分析和近代計算技術），來闡明這些新型鍵的成鍵原理和特性。

分子和其他任何客觀存在著的事物一樣，是包含着內在矛盾的統一整體，它的結構的各方面的特性也必然是統一的。現有的分子結構理論既然還不能統一解釋已發現的有關分子結構的各種現象，就說明它還沒能全面地如實地反映分子結構的實際情況。因此，我的想法是，使用一架靈活的“照相機”，既可以从較高的角度，較遠的距離來觀察分子的整体（分子軌道理論），又可以从較近的角度來分析分子內部有關原子之間成鍵的情況（價鍵理論），還可以利用多種剖面 and 投影（例如配位體場理論等），並且以唯物辯證法作為思想武器，把從各個角度攝取下來的圖片和從大量的科學實驗和生產實踐中搜集來的資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工作，提出更合適的模型，較全面的較切合實際的數學處理的方法，並回到實驗中反復驗證，根據實驗的結果不斷地加以修改，逐步綜合成為一套比較完整的新的分子結構理論。

下面，試對這幅圖景的輪廓作粗略的描述。

應該把電子屬於分子整體的觀點和價電子觀點結合起來。認為分子是由原子核骨架和核外電子組成的整體，這一觀點是從分子軌道理論吸取過來的，而且也是正確的。但在分子形成的過程中，有些電子起了主要的作用，有些電子只起次要的作用，如果不區別開來分別加以研究，則對分子結合力的規律還是不易摸清楚的。在原子形成分子的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電子特稱為價電子。那些不起主要作用的內部電子則稱為內層電子。價電子的概念是從價鍵理論來的，但其意義不但包括成鍵電子在內，而且包括反鍵電子、非鍵電子、孤對電子以及絡合物中的d電子和在某些化合物中的f電子在內，所以要比價鍵理論中所指的價電子廣泛得多。分子軌道理論不重視價鍵概念，這是它的缺點之一。價鍵理論把價電子的範圍定得太狹，所以許多事實無法解釋。區分價電子和內層電子，總結價電子的各種類型及其屬性，將是新的分子結構理論的重要內容。

我國唐敖慶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提出雙電子鍵函數理論和計算方法<sup>①</sup>，彭桓武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提出多電子鍵函數理論<sup>②</sup>。我認為，用它們來代替單電子狀態函數即分子軌

① 《化學學報》第20卷，第2期。

② 《物理學報》第11卷，第2期。



道，为价键理论的新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新的方法综合了原来的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的优点，可以克服分子轨道理论中不考虑电子间的“瞬时关联”的缺点。

价键理论中表述的成键原理主要是电子配对原理。这一原理用处很大，但局限性也很大。新理论中的成键原理则将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它应包括各种新键型的形成条件和性质以及旧键型中新的成键因素等。

新的分子结构理论还可以尝试把配位势场理论与价键理论结合起来。

新理论的发展还应注意联系实际，对萃

取化学、络合物化学、催化作用、半导体、受激发射和分子生物学等重要科学领域中的化学键问题予以优先考虑。这样，一方面借以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些领域中研究工作特别活跃，新的矛盾和新的键型比较丰富，重点研究这些领域，对化学键理论的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

这一些设想，因限于水平，不一定提得对，或不一定行得通。提出来的目的，只是引起大家的讨论，共同研究如何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化学键理论的研究中，开创出我们自己的道路。

## 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 龔 育 之 ·

讲讲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的一些想法。

(一) 《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坂田文章的按语，特别强调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思想。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辩证法讲“分”，就是指的“一分为二”，指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指的对立面的统一和

斗争。

形而上学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认为“一”就是“一”，是不可分的。辩证法也讲“一”。但是，辩证法认为，“一”是对立的统一，是可分的；宇宙间不存在任何最后的、绝对的、不可分的“一”。毛泽东同志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



同，形式不同罢了。”<sup>①</sup>

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一分为二的，不会出现绝对的不可分的“一”。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在实践上和理論上都已經破产了。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如此，就是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人們还是会划分为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它們之間还是会有矛盾和斗争。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的“分”，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罢了。

在自然界，物质的分割，也永远不会出现绝对的不可分的“一”。那种认为原子是绝对的不可分的观点（原子这个词就其希腊字源来说，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我国最初曾經把它譯为“莫破尘”），早已破产了。形而上学把它的障地从原子后退到“基本”粒子。现在，它在“基本”粒子那里的障地也根本动摇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表明：物质分割的系列，是无限的，是没有终点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结构层次上，物质的“分”，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罢了。

否定“分”的普遍性、绝对性、无限性，就否定了自然界和社会的无限发展，就否定了認識的无限发展，就使辩证法为之中断，就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停滞、死亡。

（二）有些同志对于物质的无限可分

性表示怀疑。他們觉得，“分”这个概念未必可以无限地运用。这个问题，我看可以討論一下。

承认不承认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是哲学史上古老的爭論。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記載着“辯者”的这样一个說法：“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我认为，这个說法，是以朴素的形式，从量这一个侧面，說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光辉的思想。

有許多人不能接受这个思想，不能理解一个有限物何以能够分解为无限个組成部分。其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懂得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不懂得无限由有限构成，而有限中又包含着无限。

从純粹的量的方面来分析，“一尺之棰”这样一个有限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对分，的确展开为一个无穷系列：

$$\frac{1}{2}, \frac{1}{4}, \frac{1}{8}, \frac{1}{16}, \frac{1}{32}, \dots$$

这个数的系列有无限个項，但是，它的总和是一个有限数——1。

近代微积分学建立起来以后，从量的方面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有限和无限的辩证

<sup>①</sup>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3頁。



关系。

当然，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不能只是从量这一个侧面来考察，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无限多样的质的内容。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黑格尔的话：“有限性只不过是自身的超出；因此，在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即有限性自身的他者”。列宁在这些话旁边批道：“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事件进程本身的辩证法”。“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sup>①</sup>。

如果不限于抽象的量的侧面的考察，而深入到具体的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那么，“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个说法，就不能充分说明“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了。

“半”，是个量的概念。“一”分为两“半”，事物在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量上小了一半。

辩证法不能把“分”理解为只是量的分割。

辩证法讲量变转化为质变。量的分割，到一定的阶段，引起质的变化。

且不說棰失去一定的长度，就丧失了棰之为棰的性质。当物质的分割达到分子时，就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进一步“分”，就使分子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原子。原子不是半个分子，而是同分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

东西。

原子进一步“分”，就分解为电子和原子核。电子和原子核都不是半个原子，而是同原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

如此类推。

恩格斯早就从哲学上深刻地指出：分子、原子，不是“可分性的极限”，而是“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点，它们“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sup>②</sup>，它们“决定着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sup>③</sup>。

原子论在科学史上的重大功绩，在于它实际上指出了物质分割过程中的质变，引导人们去研究物质的一种极重要的质的存在形式。旧原子论的错误，则是在于它把物质分割过程中的质变绝对化，当成了物质可分性的极限。

只讲量变，否认质变，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

(三) 有些同志提出问题：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是不是意味着，如同原子像一个小太阳系那样分为原子核（中心“太阳”）和电子（周围“行星”）一样，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也将像一个更小的太阳系那样再分为白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4—11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00页。

<sup>③</sup> 《自然辩证法》，第248页。



己的“太阳”和“行星”，如此类推，而形成一个个比一个更小的“太阳系”的无限排比？

玩具店里有一种套娃娃。打开外面的大娃娃，肚子里套着个一模一样的小娃娃，打开这个小娃娃，肚子里还套着个一模一样的更小的娃娃……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是不是就像这样的呢？不，不能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物质的结构和分割。

物质的无限可分，并不是无限地、单调地重复某一种特定的“分”的形式。

恩格斯，以及黑格尔，都批评过所谓消极的无限，这种无限的特征之一，乃是同一事物的无穷的重演。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限观。

辩证法所理解的无限，它包含着层出不穷的新质的内容。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是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结构层次的物质的“分”的具体形式，这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sup>①</sup>

在物质分割的每一个新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去探究前所未有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自然科学不断

地有新的发展，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辩证法根本不容许把某种已知的刻板的公式，强加于自然界、强加于自然科学。

其实，说原子像一个小太阳系，这只是一种粗浅的比喻。它们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完全不同的规律。研究原子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经典物理学发展到量子物理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

“基本”粒子的“分”，虽然现代物理学还没有把它研究得很清楚，无疑却预示着将会出现崭新的性质、形式和规律，研究它们，将会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自然科学在这方面的新发展，又将进一步丰富唯物辩证法关于“分”、关于对立统一、关于整体和部分这些概念，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

如果否认“分”在质上的无限多样性，而把它理解为同一模型的无穷重演，那么，自然界就成了一个贫乏的世界，研究自然的工作就成了一件无聊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就没有什么可以发现、可以创造，自然科学就不能前进，而寿终正寝了。

总之，要坚持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辩证法思想，反对那种认为存在着最后的、绝对

<sup>①</sup>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299页。





的、不可分的“一”的形而上学思想；要坚持“分”的辩证观，反对“分”的形而上学观。

（四）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关于物质的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一分为二。有科学的学说，就一定有反科学的学说同它对立；有正确的学说，就一定有错误的学说同它对立；有唯物论、有辩证法，就一定有唯心论、有形而上学同它对立。旧的对立解决了，新的对立又在前头，如此层出不穷，永远不会完结。

这个真理发展的规律，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所证明了。关于原子和“基本”粒子的学说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着那种长期在科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把原子看作可分性的极限的观点，后来为科学实践的发展明显地证明其为错误而被科学界普遍地抛弃的时候，当着原子是可分的这个思想，由于无可争辩的事实而被科学界普遍地接受为真理的时候，关于“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这个辩证观点，又在同把“基本”粒子（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种类）看作可分性的极限的错误意见作斗争。

当着那些曾经喧赫一时的否认原子的客观存在，声称原子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创造”、一种便于心灵用来再演某类事实的“数学模型”的唯心主义者（马赫之流），后来被关于原子的科学研究的光辉成果弄得声名狼籍，以致他们之中的有些代表人物也不能

不公开承认错误的时候，新的斗争——反对那种否认“基本”粒子的客观存在，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为了从逻辑上推算测量仪器上标线的度数而创造的概念（弗兰克）、认为它们“最后也还是一种数学形式”（海森堡）的新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斗争，又摆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家们的面前。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就是这样在反复不断的艰苦斗争中前进的。

必须注意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必须从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的丰富材料中，去掌握认识的辩证法，去总结认识的历史经验，用以指导现在的科学研究工作。

可惜，不少自然科学家很少注意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而且，有些书籍往往把自然科学史片面地描绘为似乎只是正确的认识不断堆积的历史。对自然、对物质的认识过程，似乎只是从正确到新的正确，没有谬误，没有对立，没有斗争。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当作真理、限制过人们的思想、阻碍过科学前进的错误的东西，一旦被普遍地认识其为错误以后，人们就觉得，似乎在自然科学史上也不值得再提起它们了。这样，它们就逐渐完全被淡忘了。后来的人们，就逐渐不大知道他们学习的那些科学的真理，是怎样不断地同错误的东西斗争而建立起来的了。

这是用形而上学观点看待自然科学史。



这样的自然科学史，不能使人真正从中得到历史的教益。

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自然科学的历史，分析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总结认识的历史经验；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

析自然科学的现状，揭露当前各种对立的学说、观点和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树立起敢于批判、敢于创新的学风。这样，就能够在思想境界上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能够比较自觉，少走一些弯路，就能够在自然科学发展中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武器

· 艾 思 奇 ·

我对自然科学没有专门研究，但很愿意向自然科学界的同志们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也要重视自然科学的成就。自然科学家们把自己专业方面的新发现、新理论介绍出来，可以帮助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和群众增长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对研究哲学的同志也会给与很多助益，使他們有可能依据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来加深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

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的文章，从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理论方面，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

唯物辩证法不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也是探索自然界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自然科学的每一次新的发现和新的进展，都使唯物辩证法获得新的证明或发展。形而上学思维总是力图把科学上的现有成就解释成最后的东西，而科学上的每一新的进步都使这种企图宣告破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的可分性是无限的，宇宙的发展和人的认识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由原子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粉碎了与此相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坂田等理论物理学家的成就向我们证



明，自然科学家们如果能够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将有可能加快他们工作的进展。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家研究基本粒子的历史本来是比較短的，但他们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成就。坂田等几位科学家能够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来，不能不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事实，有说服力地駁倒了那种反对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研究的观点。

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是，正确的思想指导，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曾經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到了现代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受到阻碍，表现出畸形化的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过程，还常常受到主观方面的思想条件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界，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居于統治的地位。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广泛地影响着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理論自然科学研究。主张哲学无用論的人们，不承认自然科学家的思維活动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到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实际上，不受任何一种世界观的影响的人是没有的。主张哲学无用論的人，他们自己的

观点，往往就是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是同“实证論”的观点密切联系着的。“实证論”的观点实质上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不可知論和主观唯心主义，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的哲学观点，它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

像坂田昌一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打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传统的束縛，和流行欧美的“实证論”断然决裂，和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断然决裂，自觉地拿起唯物辩证法这个真正科学的武器，这是十分可貴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比资本主义社会远为优越的社会条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其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一样，都应该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巨大的跃进速度。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中国十几年来来的历史证明，一个原来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一旦有了无产阶级专政，认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路綫，就会以惊人的步伐迅速走向先进的地位，就会給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极为广闊的天地。

但是，有了优越的社会条件，还必须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指导，科学技术工作才能更加順利地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



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科学工作者如果不能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完全有可能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各种反辩证法思潮的影响，从而阻碍科学工作的进步。

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断地号召各方面的工作干部，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要把哲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大革命群众手中的武器。这个号召在国内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深入人心。近几年来，我国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在各个科学领域包括一些尖端科学领域中，取得了许多成就。这

些成就，都是同他们日益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的。尤其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工农群众，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启发了自己的智慧，能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矛盾，突破生产技术方面的许多旧框框，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自力更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就变成越来越强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毫无疑问，只要循着这个方向努力前进，不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攀登上科学的高峰，把我国科学技术提高到现代的先进水平。

##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

· 于 光 远 ·

《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发表坂田昌一的文章时所写的按语中，强调指出：要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正是给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提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改进我们的科学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它是在社会实践（包括科学实验）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特别复杂的认识活动。要掌握这种认识活动

的艺术，除了学习哲学发展的最高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又有什么别的途径呢？

如果科学工作者能够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自觉地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研究工作中来，那就可能在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洞察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否则，就难免在探索的过程中走上斜路或者多走弯路，使研究工作遭受损失。



早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恩格斯就已經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經成为不可能的了”<sup>①</sup>，“摆脱了神秘主义的辩证法，逐渐变成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sup>②</sup>；恩格斯还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家不懂得运用辩证法，“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統治着他們”<sup>③</sup>，如果他們能够接受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就“可以免除他們經過无穷尽的歧途以及在錯誤方向下浪费无限的时间和劳力”<sup>④</sup>。

从恩格斯讲了上面这样一些話以来，自然科学又经历了飞跃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成就，迫使人們更加无法否认自然界的极其明显的辩证性质。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突进到嶄新的領域，远远超出了人們的日常經驗的范围，抽象程度越来越高，理論、概念不断地經歷着急剧的变革，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哲学上的一些新的紛扰和混乱。今天，許多自然科学家仍然为资产阶级偏見所囿，作着“最坏的哲学的奴隶”<sup>⑤</sup>。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坂田昌一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还是不多見的。在那里，仍然像恩格斯当年所說的：“学会用辩证法去思維的自然科学家，还是屈指可数”<sup>⑥</sup>。

在我国，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是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伟大成就的結果，这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在革命和建設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思想的結果，这是党对科学技术工作者长期进行教育的結果。虽然人們的認識和觉悟程度有所不同，

虽然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改进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取得的經驗和成果还是初步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現象，它标志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自然科学領域中开始取得胜利。

当然，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間也还存在一些思想認識問題，需要解决。

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以为，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这只是少数搞理論自然科学的人的事情，甚至只是那些有特殊的哲学兴趣的科学家个人的事情，“普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用不着关心。他們以为，学习和研究哲学，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外的事情，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額外工作，而不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中的事情，不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本分工作。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因襲了资产阶级知識界对于哲学的流行看法。革命的知識分子，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根本不能这样看待的。

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的大革命。它根本不同于为少数精神贵族所垄断的那种资产阶级哲学。它是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精神武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广大人民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了科学文化的主人的时候，更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和普及，开辟了广闊的道路。

①②③④⑤ 《自然辩证法》，第1、168、25、9、173頁。

⑥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頁。



毛泽东同志号召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課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銳武器。

在我国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中，現在正蓬勃地开展着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辯证法的伟大的思想运动。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大普及的运动，是我国人民群众思想認識大提高的运动。这个运动，使我們在階級斗争和对自然界的斗争面前的主动性、自觉性大大增强。我們革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怎么能够为资产阶级知識界的因襲观点所束縛，而落到这个运动的后面呢？怎么能够把学习和研究唯物辯证法看作分外的事情，而不看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呢？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放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外，而不貫串在研究工作之中呢？

还应该看到，我們的任务是要进行一个伟大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我們要把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统统吸取过来。但是，我們不能只是跟着外国资产阶级的脚印，亦步亦趋，作他們的尾随者。我們要走自己的道路。我們要使科学技术工作者用先进的哲学思想武装起来。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經实现了一个科学技术的革命，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陈旧的生产技术抛到历史的后面。同这个科学技术革命相适应，资产阶级还实现了一个哲学革命——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在当时是进

步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培根到狄德罗)，代替了沒落的封建阶级的、衰朽的、令人窒息的經院哲学。虽然他們的唯物主义还只限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但終究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沒有这个哲学革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走向沒落，它的哲学也走向全面的沒落，由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轉向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沒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哲学，同发展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矛盾，說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当前科学思想的危机。

我們要在现代实现一个新的、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就必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实现一个新的、比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更加伟大的哲学思想的革命——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辯证法思想代替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使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自觉地走向唯物辯证法这个“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sup>①</sup>。

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把学习和运用唯物辯证法看得很难，怕用得不好。我們认为，在解决“用得好不好”的問題之前，首先要解决“用不用”的問題。只要願意用，經過努力，是一定能够学会用的。努力的办法无非是，带着問題学，从实践中学，从錯誤中学；在学习中不断总结經驗、解决問題。一个人解决不了的問題，几个人来集体研究；一时解

<sup>①</sup>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30頁。





决不了的问题，长期坚持研究。经过这样的学习，必定会有成效。

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觉得各种工作很忙，无暇顾及唯物辩证法的学习。我们觉得，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无论怎样忙，决不应该使自己忙得连考虑改进科学研究方法的时间都没有。越忙越要寻求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越忙越要挤时间学习。

其实，所谓“难”和“忙”，只不过是表面的理由，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对在研究工作中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有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能够认识到学习唯物辩证法是工作革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了做好自己工作绝对必需的东西，是每一个革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尽的责任，那么，“难”和“忙”也就不成其为理由了。

现在，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用歪曲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来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和修正主义思想泛滥的国家里，正喧嚷得很热闹。彻底批判这种反动思潮，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一项重要课题。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了过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經驗，为这种批判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也应当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新經驗，给披上现代科学外衣的时髦的资产阶级哲学以致命的打击，来捍卫、宣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现这个任务，不仅需要哲学工作者的努

力，而且需要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参与，需要双方结成战斗的联盟。

各个科学部门有它自己的带有一定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论在某一个科学部门的具体化。研究各个科学部门的研究方法，是学会在解决各个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项必要的工作。

现在，科学技术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相互之间合作的需要也越来越多。如果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注意专业间的相互学习，不注意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不能从自然界的整体上、从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上形成科学的自然观，那就很难避免由于专业分工所带来的狭隘眼界而陷入形而上学。

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我们的国家里，不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私人的事情。因此，需要很好地组织和领导这件事情。这是党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的一条大路。这里，要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学术问题上应当允许和鼓励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讨论，通过这种讨论，通过争辩，通过实践，来判明不同观点的是非，而不是用武断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推行一种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要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不尚空谈，不搞形式主义，努力把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同科学实验密切结合起来。



# 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变成了 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

李 哲

近几年来，在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一股歪曲和修正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逆流，大肆宣扬“矛盾融合论”，说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统一规律“已经过时了”，“不能把矛盾描述成社会主义的推动力量”，“协调和绝对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等等。在三十年代曾经是德波林学派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些批判者，今天却大肆宣扬矛盾融合论，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他们提出一个所谓“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sup>①</sup>的公式。这个公式集中地表达了矛盾融合论的实质。

过去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曾经参加过反对德波林学派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的斗争的一些人，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逐渐充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辩护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投降了德波林。

过去，这些人在批判德波林时，曾经说过：“孟什维主义的唯心论者，脱离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他们描绘一个完全机械的表式，依据这个表式，我们首先遇到简单的差异，然后发现对立，再后才见到矛盾。他们不了解，在每一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他们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地限制矛盾发展规律之普遍的性质。可是列宁却相反，他着重地指出对立的统一，统一和相互贯通之有条件性，暂时性和相对性，而它们的互相否定，互相排斥，它们的斗争——成为发展之动力的斗争，却具有绝对性。”<sup>②</sup>

现在，这些人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解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过去说：“物质……在它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阶段上，它始终是内部包含着矛盾的。”<sup>③</sup>“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科学工作任务》。苏联《哲学问题》1962年第4期。

②③ 米丁：《辩证法唯物论》，生活书店1948年第4版，第261、515页。



現在却說：“辯證的對立面、矛盾，轉變為差別”。

過去說：“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都由於諸對立面的鬥爭而發生變化，不論這些對立面自身的性質如何。”<sup>①</sup>

現在却說：“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通過內部的一致加強、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相互適應的途徑來完成的。”<sup>②</sup>

過去說：“矛盾，決定社會之運動和發展的內在矛盾，即在社會主義時代也還是有的。”<sup>③</sup>

現在却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新的現象、新的過程在社會生活中發展起來。例如，辯證的對立面、矛盾，轉變為差別，差別融合為統一。”<sup>④</sup>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他們在三十年代曾經宣傳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關於對立統一規律的學說，到了六十年代就忽然失去作用了嗎？

不，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它適用於過去、現在和將來。它既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和將來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只是在不同的社會中，矛盾的性質和情況有所不同。對立統一規律是永遠不會失去作用的。問題是，當年的一些德波林學派的批判者，現在

成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宣傳工具，他們背叛了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拾起了曾經被他們批判過的德波林的破爛的哲學衣鉢。

## 二

現在這些德波林學派的繼承者所提出的“對立面、矛盾，轉變為差別，差別融合為統一”的公式，從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德波林的所謂“從單純的等同，經過差異和對立而達到極端的矛盾”<sup>⑤</sup>的公式相反，但是，只要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就會明白兩者在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

在否認矛盾的普遍性方面，他們和德波林的說法雖然不同，但其實質是完全一致的。德波林說：“無區別的同—是一種純樸狀態，一切存在物都應當從‘純樸’狀態中，即從無區別的抽象的同—中擺脫出來。同—轉化為差別，差別又轉化為對立，而後又轉化為矛盾。”<sup>⑥</sup>德波林認為，矛盾不是過程一開始就產生的，矛盾產生在出現差別之後，差別並不是矛盾。現在這些德波林學派的繼承者則認為，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轉變為差別，矛盾不存在了。這裡，說法不同，只是簡單的

①③ 米丁：《辯證法唯物論》，第262、486頁。

②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衰退》。蘇聯《共產黨人》1962年第10期。

④ 《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領域內的科學工作任務》。蘇聯《哲學問題》1962年第4期。

⑤ 轉引自米丁：《辯證法唯物論》，第516頁。

⑥ 德波林：《哲學與政治》，1961年俄文版。



邏輯换位，并无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并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矛盾不是普遍的、绝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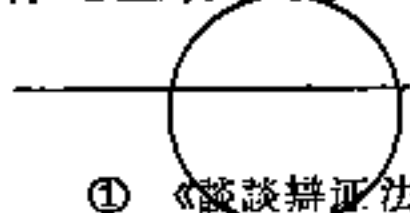
德波林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而是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就是说，矛盾不是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那末，在那一时期以前，事物的发展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所说的矛盾转变为差别，其实质是说矛盾在过程开始时是有的，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没有了，就转变为差别。他们和德波林一样，也不承认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的动力就不再是事物的内部矛盾，事物的发展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可见，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也同德波林一样，完全陷入了形而上学外因论和机械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

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sup>①</sup> 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过去也承认德波林的哲学观点是同列宁的观点根本对立的。可是，现在却背叛了自己曾经赞成过的真理，走上德波林否认矛盾、取消矛盾的老路，公然与列宁的观点相对抗。

在处理矛盾的问题上，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和德波林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采取了调和矛盾的方法。德波林说，事物的发展是：“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的等同，经过差异和对立而达到极端的矛盾——都过去了的时候，‘解决矛盾’的时期就来到了。”<sup>②</sup> 可是怎样来解决矛盾呢？在德波林看来，矛盾的解决并不是经过矛盾的斗争，而是经过矛盾的互相调和。他说：“积极的辩证法认为，正题和反题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而是互相调和的对立面。”<sup>③</sup>

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过去曾对德波林的调和矛盾的观点进行了正确的批判。他们说：“孟什维主义的唯心论者违背了列宁对这一对立统一规律之典型的解说，……他们不把它解作斗争的规律，不解作发展的规律，而解作‘综合’的规律，调和对立面的规律。”“德波林提出了他对这一规律之孟什维克式的解说去对抗列宁关于这规



-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7—408页。  
② 转引自米丁：《辩证法唯物论》，第516页。  
③ 德波林：《论康德的辩证法》。



律之最完滿、最周密地表現世界發展之本质、社會鬥爭之本质的公式。这种唯物辯證法的規律的解說，是一般修正主义者所特有的，实际上是他們在工人运动队伍中所进行的叛逆路綫之理論的表現。”<sup>①</sup>

可是，按照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提出的公式，对立面、矛盾要轉变为差別，并且互相調和，合二而一。就是說，矛盾的解决不是經過对立面的斗争，而是經過对立面的融合、調和。这不正是同德波林的观点一脉相承嗎？他們現在借口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現象、新的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了，以此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可以融合的理由。但是，他們过去曾經說过，“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都由于諸对立面的斗争而发生变化”。“矛盾，决定社会之运动和发展的内在矛盾，即在社会主义时代也还是有的。”在这里他們正好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列宁曾經明确指出：“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暫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則是絕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絕对的一样。”<sup>②</sup>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看来，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的斗争是絕对的，而統一是对应的。一切矛盾只有經過斗争才能解决，否认斗争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否认了事物的发展。矛盾只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之分，

沒有可以調和与不可調和之分；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过去也承认德波林的哲学观点与列宁的这一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可是，他們現在和德波林一样，公然同列宁相对抗。

按照他們現在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再是社会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而是“内部的一致的加强”。这岂不同样是“违背了列宁对这个对立統一規律之典型的解說”嗎！岂不同样是不把矛盾看成是“斗争的規律”、“发展的規律”，而看成是“綜合的規律”、“調和对立面的規律”嗎！这岂不是用主观杜撰的公式去对抗列宁的公式嗎！他們过去說德波林的观点“是一般修正主义者所特有的，实际上是他們在工人运动队伍中所进行的叛逆路綫之理論的表現”，这些话，今天不是完全适用于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自己嗎！

德波林和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公式，都不是什么新的“发明”，而是对黑格尔哲学保守方面的拙劣的摹仿。

我們知道，黑格尔的哲学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即辯证发展的思想。但是，这个“合理的内核”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

<sup>①</sup> 米丁：《辯证法唯物論》，第 522 頁。

<sup>②</sup> 《談談辯证法問題》。《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08 頁。



系基础上的。因此，决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而必须对其保守的、反动的方面，给予全面彻底的批判；对其辩证发展思想的“合理的内核”，要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救出来，并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这个伟大的任务，早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地解决了。

但是，德波林不仅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批判黑格尔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吸取其“合理的内核”；相反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抄袭了黑格尔的糟粕。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发展的“逻辑阶段”，是按同一、差别、对立而达到矛盾，最后又回复到“绝对精神”的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这个公式显然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的糟粕。而且，即使是黑格尔，当他谈到同一的时候，也不认为同一是抽象的绝对地同一。在黑格尔看来，同一本身是包含着差别的。他说：“勿把同一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异’的‘同’。”<sup>①</sup>也就是说，矛盾并不是一下子就以最终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而首先是采取差别、对立的形式。当然，黑格尔是唯心辩证论者，这里是说概念的发展，这些说法本身是含糊的、神秘的。而德波林则说：“在绝对同一的环境中，当其中由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对立面没有形成之前，就不可能有发展。”<sup>②</sup>这就是说，德波林把同一看作是不包含任何差异

的抽象的同一。

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在过去曾经尖锐地指出，德波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行了黑格尔式的修正，企图用黑格尔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现在同德波林一样，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糟粕。黑格尔认为，矛盾只在一定阶段进行，“绝对精神”在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一切矛盾都要调和起来，运动发展也停止了。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的公式，正是抄袭黑格尔调和矛盾、融合矛盾的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进行了恶毒的修正。

### 三

德波林和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公式，虽然是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但其目的都是为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辩护。

德波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修正和歪曲，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德波林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进行恶毒歪曲和攻击的时候，正是苏联人民在联共（布）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实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8页。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1961年俄文版。





現列宁关于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总路綫而斗争的时期。随着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拚命反抗，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这种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样是十分尖锐的。社会上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时在联共党内先后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资本家、富农阶级的利益，都疯狂地反对党和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抹煞阶级斗争。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提出了臭名远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論”和国民经济发展“平衡論”，主张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同资本主义成分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应当处于斗争状态，而应当是平衡状态，主张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德波林派公然站出来攻击革命辩证法，提出了他們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反革命集团提供“理論”武器。

按照德波林的观点，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富农和劳动农民之间只有差别，并无矛盾，这就完全同意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否认阶级对立的反动論調。既然在苏联社会里，只有差别，并无矛盾，那么，什么阶级斗争、什

么社会主义革命，统统是多余的了。德波林派对于对立统一規律的歪曲和攻击，正是为了适应布哈林等反党集团反对革命、反对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綫的需要，帮助他們宣扬阶级調和和阶级合作，宣扬矛盾融合論。

現在，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所杜撰的矛盾融合論，正是在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以阴谋手段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路綫的时期提出的，其目的是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制造哲学根据。

德波林的哲学早已彻底破产了。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哲学，也必然要随着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路綫的破产而破产。

\* \* \*

曾經批判过修正主义的人后来变成修正主义者，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是有先例的。考茨基曾經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作过一些批判(虽然这种批判是无力的、敷衍了事的)，后来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义，投降了伯恩斯坦，成为伯恩斯坦的拥护者。普列汉諾夫也对伯恩斯坦以及孟什维克的某些观点作过斗争，但最后也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变成了孟什维克。

三十年代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現在成为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成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辯护士，这又一次給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大的教訓。



# 飞夺泸定桥

楊成武

## 光荣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紅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場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軍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蔣介石正在命令四川軍閥楊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潭元部銜尾猛追。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場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蔣介石也梦想着把紅軍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紅軍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須火速夺下泸定桥。我們左路軍前卫紅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接受了林彪軍团长的命令——坚决迅速夺取泸定桥。紅一师为右路軍，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

## 胜利的第一天

二十三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場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規定三天赶到。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腸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終年不化的积雪，銀光耀眼，寒氣襲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濤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險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泸定桥。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敵軍便开始向我們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謂伤亡，只得繞路爬山，繞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約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連忽然和敌人一个連遭遇，勇士們好像猛虎見了群羊，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



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营长季光顺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坳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连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击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

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夹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 一天二百四十里

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時間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从我们来路方向，一匹大黑马像旋风一样飞来，直奔团部的行军位置。我定眼一看，是军团部的骑兵通信员。他从马上交给我们一份命令，我和团长并辔而行，凝神细读。命令上写道：“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二十五日夺下泸定桥。你们要以最高速度的行军和机断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在此次战斗中，要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取鸭溪一天走一百六十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着庆祝你们的胜利。”后面是军团长林彪同志刚劲有力的签字。看完命令后，我和团长面对面地凝视了一会，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一个十分光荣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哪！”

“二十五号！”二十五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是命令，这是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

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



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传达军团首长的命令，进行政治鼓动。队伍像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像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

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同志们把这样的开会法，叫做“飞行会议”。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的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当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濘，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

困难越是严重，越须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像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熾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濘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像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

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籬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敌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题。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谁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像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



得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直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两岸及两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 要桥不要枪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

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門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門，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接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





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直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

“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像座小铁塔，嘴巴像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须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

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門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門口漫天大火，似乎楞了一下，站在我 and 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



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狽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

六十里竹林坪地区还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聶荣臻政委进入泸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聶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翻出了一份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共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复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

第三天，林彪军团长带着军团的主力来到了。他热烈地祝贺我们完成了任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接着毛主席也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 大石塔农村的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问题的材料)

徐 稚

**编者按：**这是一九四七年徐稚同志在晋西北参加土地改革以后所写的一篇材料。原来准备继续写下去，叙述一九四七年春天这个村子完成土地改革运动的各项经过，但因为有别的事，没有完全整理出来。现在发表这一部分，供同志们做调查研究的参考。

大石塔——是山西静乐县潘家庄行政村的自然村之一。这个行政村包括有潘家庄、张家庄、大石塔(也叫大圣堂)、城东沟四个自然村，以潘家庄为主村。

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是接近游击区的解放区。

一九三六年春天，红军东征，经过这个地方，群众初步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军队。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由红军编成的八路军于这一年十一月开到这里。一九四〇年六月间，八路军在这里附近十五里的米峪镇，消灭了五百来个日寇，是晋西北有名的战斗之一。这一年十月间，日寇从这里过路，烧房子，烧粮食，没有住下来。又过了一个月，日寇来“扫荡”，住了几天，继续烧房子、杀人、奸淫。此后每年日寇最少来两三

次，见人杀人，见妇女奸淫，见东西拿东西，不能拿走的就烧。日寇使人民受尽了严重的灾难，但人民也就在这种残酷的战斗中，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之下，步步地锻炼了自己，获得了觉醒，赶走了日寇，并变迁了农村旧日封建制度的面貌。

原来这个行政村的地主，以大石塔的高家地主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单由高时成算起，已经历了四代。高时成在离这里四十里的娄烦镇开生意，贱买粮食，在荒年时贵卖，并利用了荒年集中土地。例如：潘家庄的二百来亩好平地，就是高家在光绪四年闹荒年时以一亩两三升米的贱价收买的。该家集中土地最盛时，在本村及外村约有二千来亩好平地，除本村外，外村租户也很多，每年收



过一千担粮食。支出的粮银达八十来两，所收下的粮食，都等粮贵时才卖。当閻錫山統治时代，本村有五十戶，三百五十人，其中有由高时成这个血統分家下来的四家地主，在全自然村的九百三十八亩平地当中，还占有五百六十五亩。即占戶数百分之八的地主（按人口約为全村的百分之十二），占有百分之六十的平地——且都是最好的平地。这四家地主当中的高登汗一家，为高时成的长房孙，占有二百四十五亩，为全村平地的百分之二十六，其在外村也曾經有二百四十亩左右的平地，一共是四百八十多亩。这高家地主原来也是这整个行政村政治上的統治者，高登汗当过十三年长时期的閻錫山的編村村长，結合了封建的土地剝削与政治剝削。

在閻錫山統治时代，除了高家地主外，又有一家张姓經營地主，有好平地六十六亩。合这一家，地主戶数占全村百分之十（按人口为百分之十四），占本村平地約为百分之六十七强（六百三十一亩）。

本村原来有富农三家，为全村戶数的百分之六（按人口为百分之七），其中两家各有平地五十四亩，一家为三十九亩（曾經又买过高家地主的地，合之为六十六亩），共有平地一百四十七亩，为本村平地的百分之十五强，也都是好平地，但其中一家在抗战前已經完全破落。

有平地的中农原来只有七家，为全村戶数的百分之十四（按人口为百分之十一），共有平地一百四十三亩，为本村平地的百分之十五，但都是下平地。

全村的好平地是集中在戶数占百分之十六或人口占百分之二十一的地主富农手里，全村百分之七十的戶数或百分之六十八的人口却完全没有平地，而在这里基本的土地問題却就是平地的問題。

在抗日战争之前，高家地主的外村土地早已大部卖出，本村的土地也已有一部分卖出。四家已分裂为六家，但合起来的人口却变少了。高家地主的全盛时代算已是过去的了。但高家地主土地的大量轉移，乃是八路军在这里創造解放区而带来共产党的合理負担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之后。

在六家高姓地主的五百六十五亩平地中，除了抗战前卖出的为一百零五亩之外，在抗战中陸續以买卖形式轉移到农民手里的为三百零三亩，减租清算出的为六十九亩，其他关系轉移的为十八亩，共为三百九十亩，合战前卖出的，共为四百九十五亩，占高家地主原来平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在这轉移当中，以买卖的形式占大多数。在实施合理負担的政策之后，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的献金运动开始了这种土地一批一批地出卖的潮流，而以一九四三年减租运动真正发动后的次年——一九四四年，达到了最高潮。

这种卖出和抗战前的卖出有根本的差别：一方面，抗战前个别地主出卖土地，仅为的是它私自家庭或这样或那样的财政原因，而在这里成为解放区之后，一般地主的出卖土地，乃是由于共产党反封建和扶助农民的政策，由于有广泛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抗战前卖出的价格都是很高的，例如：前述



高家賤买潘家庄二百来亩平地，在一九二九年却以一亩四十元的高价卖出。如果在抗战前普通平地一亩折十元来说，这时就只要三元，四元或五元，特别在一九四四年很多是一斗米便可以买到一亩。也有较高价的，但究竟是少数的情况。一般看来，到了一九四四年，即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封建剥削制度已根本被群众的威力压垮了。

一九四七年春，土地改革的工作团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土地的占有情况，大体上就是一九四四年大转移之后的情况：这时全部高家地主的土地已只有七十亩，即由原来占全村平地的百分之六十已变到百分之七点五。张姓那家经营地主也起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减租与转移及分散给自己亲属的结果，已由六十六亩的平地减为十亩。两家富农也因为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而转移出若干平地。

抗战之前，大石塔的租地户，有二十七户，占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四；没有平地的户数，有三十五户，为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但在成为解放区之后，除了两三户以外，已都有或多或少的平地。多数农民几多世代梦想不到平地，但在共产党的政策下面，几年之间，却能够轻松地取得。这是新旧社会根本的变迁。这是这里农民群众积极支持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而进行的解放战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拥护毛主席的主要经济基础。忽视这种土地的转化，就不能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之无限力量的泉源，就不能了解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说“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

这种土地的大转移，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这里的老百姓众口同声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民主政府的法令是对的。那末，民主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这时是否已经完全解决了呢？

这时还存在的问题，大体上看来，是：

第一，在减租清算当中，斗争的果实本来应该按照农民群众的家庭经济状况，实行公平的分配，但因为运动初期的情况，是“谁算归谁”，所以，就只有租佃关系或债务关系的，才能够取得土地，而没有租佃关系或债务关系的若干穷苦农民却就不容易取得，或者取得较少。

第二，经过买卖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的地主土地，卖价较低，本来也可以经过有组织的调节和人民政权对于极端贫苦农民的财政援助，使土地达到更合理的分配，而还没有这样做，所以，有一定购买能力的，就能购得或多购，缺乏购买能力的，就购得很少，有的就不能购得。

这两点都是由于还缺乏一个更有系统的自觉的群众运动所产生的。

这样，就使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必须进一步地、充分地、全面地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来彻底消灭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

土改工作团正是带着党中央提出的这个任务，来到大石塔，从事试点的工作。

